

YXZSLPJ

# 诗文需有大境界·寓真著述论评集

苏华 编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晋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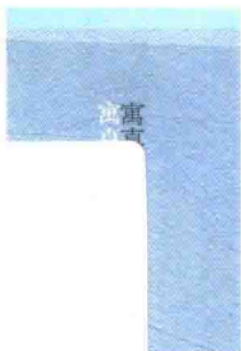
体味写诗

张伯驹  
世韵沉

晚籁集

寓真

张伯驹  
世韵沉



上架建议◎评论集

ISBN 978-7-5457-1293-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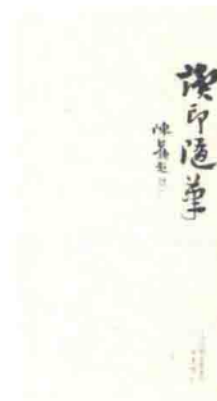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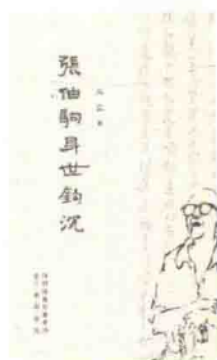


9 787545 712933 >

定价:26.00 元

# 诗文需有大境界·寓真著述论评集

苏华 编

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© 三晋出版社

此为试读,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[www.ertongbook.com](http://www.ertongbook.com)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诗文需有大境界：寓真著述论评集 / 苏华编. --  
太原：三晋出版社，2016.1  
ISBN 978-7-5457-1293-3

I. ①诗… II. ①苏… III. ①中国文学-当代文学-  
作品综合集 IV. ①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06716号

## 诗文需有大境界·寓真著述论评集

---

编者：苏华

责任编辑：冯岩

责任印制：李佳音

---

出版者：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三晋出版社（原山西古籍出版社）

地址：太原市建设南路21号

邮编：030012

电话：0351-4922268（发行中心）

0351-4956036（总编室）

0351-4922203（印制部）

网址：<http://www.sjpbs.cn>

---

经销者：新华书店

承印者：山西臣功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---

开本：850mm×1168mm 1/32

印张：8.75

字数：180千字

版次：2016年1月 第1版

印次：2016年1月 第1次印刷

书号：ISBN 978-7-5457-1293-3

定价：26.00元

---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代序

## 诗文需有大境界

### ——关于文学创作的一封信

寓真先生：

前几天继红先生着人将尊作《张伯驹身世钩沉》送来。印制之精美，在三晋版近年图书中可谓少见（新近出版的《山西民国读本》亦堪称精美）。这也可见出版界人士对先生及先生的这本书的敬重。书中附有陆机《平复帖》影印册页，也可说是一创新，让多少平常人看到了这一国宝的真面目。当系原大，可惜没有说明，因为人们总觉得既为国宝，定会大些。

您的这部书稿，在《黄河》杂志上发表时，前面几章当时就看了，有别的事打扰，后面几章没有看，这次拿到书，将后面几章翻阅一过，全书就可说是拜读了。原拟写篇讨论文章，送报刊发表，后来想，有些话见报文章上未必能说，还是写封信，直抒胸臆，较为妥当。

您先生，在政界是省高院院长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，说声威显赫，一点不为过。在文化界，您是诗人，是散文家，也是众人

皆知，皆认可的。然而，人们还是小看了您，近年来您接连推出两本书，一为《聂绀弩刑事档案》，一为《张伯驹身世钩沉》，让人大为震惊，也让人耳目一新，甚至议论纷纷，说李院长这人真不可捉摸，当着那么大的官，背地里下这么大的功夫。我也和别人一样，有这样的感慨。或许是与您接触的多些，感慨之余，我还想些别的。我之所以不愿写文章而愿意写信，就是因为想到的又想说的这些，不便在文章里说。您要知道，写篇一两千字的文章且能达到发表的要求，对我来说不是难事。至少所用的时间，会比写信少些。我的感触有两点，一是对书的，一是由书而引起的。如果有时间，还想说：作家身份的变换。

这本与那本写聂绀弩的，都是以资料取胜，那本多得自档案，更让人惊悚。这本以后面附的影印件推断，也该是档案材料，区别在于，一是民国时的档案，一是共产党执政时的档案，且是公安局的、监狱的档案。从隐秘与惊悚上说，还是后者更吊人胃口，开人眼界。本书第八章，名为横祸飞灾上海滩，第二节名为函件披露人情竟然如此冷漠。其中说，张氏被绑票后，盐业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任凤苞如何的冷漠，如何指示上海方面不得牵涉到银行，看那来往电报的措辞，也还允执其中，言之成理。就是您先生，也不得不说“任凤苞坚持不能动用银行的款项，涉及全体股东的利益，这无疑是正确的决策”。而《聂绀弩刑事档案》中写到新中国成立后文化人之间的告密与倾轧，真能让人心寒，让人拍案大骂无耻。这只是材料的不同，对一部书稿的成功与否来

说,最关键的还是材料的铺排运用。这部书在这上头,最大的特点是,能铺得开,能收得拢,迤邐而来,又迤邐而去。来之时如黄河之水,滔滔滚滚,声震云天,去之时如高空鸿雁,盘桓流连,不忍远去。前者最为明显,如前面三章,写张镇芳其人,写盐业银行问世,写复辟案始末,到第四章正式着笔写起张伯驹这个人。后者可举第九章的后一部分为例。谈了西安之行的最后一个目的,是为了参与后方的文化活动,这一章就可以说完了。写了游武侯祠的《扬州慢》词,写了赴兰州演戏的经过,加上几句感喟,便是一个不错的收束。作者却宕开一笔,说起抗战期间演戏且是演旧戏,是否与抗战的气氛不适应这个话题。结论是“传统文化活泼泼地跃然于民间,正是民族的生机所在”。这下该完了吧,还不行,又谈起闻一多先生在抗战期间对画展的一番激烈言论。由闻一多又写到持相反观念的张大千,最后的最后,引用了张著《红氍纪梦诗注》一段抗战赴西安途中看家乡戏的回忆,这才余音袅袅地停了下来。

由此书而引起的感触是,您的这两部书,如何能写的这样有品格,有境界。这个问题我早就考虑过,以前是模模糊糊,现在看了写张伯驹的这本书,就明确了。我的看法是,不说出身,也不说经历,您是真正热爱文学,热爱传统文化,由于学习,由于浸润,而具备了中国传统文化人品格的人。出身没有成为您人生的陷阱,长期官宦生涯也没有泯灭了您人性的真淳、聪敏、好学,以诗词为途径,直逼中国文化的底里。从早先我与您的交往中,我就

感知到了这一点。比如我办《山西文学》，若无隐秘，来信与来稿同等处理，该引用的就引用，该发表的就发表。记得我们发表过一个作家的信，引起这位作家的不满，打来电话，嫌未经允许刊出他的私人信札。我当时听了只有好笑。我也发过您一封信，后来见了面，你只是笑笑，什么也没说。我当时的感觉是，您并不喜欢这样的做法，只是觉得，既已入了这个行，权且入乡随俗吧。和这样的作家打交道，不能太计较。这，正是您的智慧，您的胸襟，您的境界。智慧、胸襟、境界，是什么，说白了就是一种不在乎。只有这种小事上不在乎，才能做成大事情。

那个时期，您的这两本书还没有写，写得最多的是旧体诗。我不懂音韵，从不写旧体诗，偶尔写上一首，必定注明为俚句即顺口溜。但我最是喜爱旧体诗。你的那些诗，我是品味了又品味的。这上头，我信奉“境界说”。有境界，句子拗一点，也是好诗，无境界，再精巧，也不能说是好诗。境界有大有小，王国维说境界不分大小，意即不能以境界的大小论诗的好坏，这自然不错。但我认为，境界还是大点好，高点好。当今之世，何为大境界高境界？我认为应当是：家国情怀，身世之叹。这一点在您当年的旧体诗中，有充分的表现。记得吗，当年《山西文学》上曾发表过您的一首写己巳之变的诗，是首长诗，五言古风，写自己在家乡为父亲治丧，忽然接了命令必须按时赶回省城，那份焦急，那份不安，要给别人，极有可能写成一首庆功诗，您的诗中，并没有违碍的话语，但让人感动的是，一个相当于封建时代的臬台大人，如

何既忧国体又忧生民,焦急万分地赶往任所。我看了这首诗,很是感动。身世之叹的诗,记得有两句:“亲丧十载谤无止,擢官千员怨愈多。”真是沉痛,真是大气啊。这两句的字句不一定准确,不查了。

这两年,先出了写聂绀弩的书,又出了写张伯驹的这本书,我就想,您从那个时候走到今天,写这么两本书,实在是再自然不过的事。职务给您的便利是次要的,心慕神追,才是主要的。由写旧体诗到写旧体诗的奇才聂绀弩,由喜爱收藏到写收藏巨子张伯驹,关键是,他俩都是“数奇”之人,命蹇之人。由书而引起的感触就说这些,下面说:作家身份的变换。

诗人、作家、学者,好多人一旦选定或确定,就像旧时代的妇人一样,非从一而终死而后已。精神可嘉,其愚也可叹。人生的角色是在不断地转换着,人生的方向也是在不断地寻觅着、调整着。或许前半生的种种努力,只是后半生的一个铺垫。或许一生的辛苦,只是为了晚年的两句诗,一篇文。我要说的意思,近似于《张伯驹身世钩沉》中第160页下半页的那段文字。

祝文祺

韩石山

2013年11月12日

## 《张伯驹身世钩沉》前言

寓 真

—

对于张伯驹的事迹,广大读者并不陌生。但许多人也许知其然,而不知其所以然。

出身于一个大官僚、大地主、大资产阶级的家庭,正处在二十世纪那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,张伯驹却走了一条自己独往的道路。他既没有投入熊熊燃烧的革命斗争的烈火,也没有充当他出身的那个没落阶级的卫士而成为牺牲品。在一枰激战甚烈的棋局中,他不过是一枚游离于局外的棋子。然而,他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,得到了世人的敬佩。这也许就是一个可以令人回眸而凝思的奇迹。

世界丰富多彩,人生形形色色。世人走着不同的人生道路,抑或是自己的选择,更似乎是天意的安排。出身、环境、天资、气

质、机缘、经历，诸多因素决定着事业的成败和价值的实现。

说到张伯驹的身世，会让人想起李白的诗中名句：“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千金散尽还复来。”

李白有谪仙人的气质，性情豪放，而“千金散尽”的另一个因素，则是有钱。这位大诗人出身于四川富商家庭，二十五岁时“仗剑去国，辞亲远游”。他广交天下朋侣，两赴长安求取功名，当然不只是身佩宝剑，而且是腰中缠了金银的。

我们看张伯驹，生性嗜好艺文，淡泊功名，以收购国宝而驰名，亦有“千金散尽”的豪气。而他的家庭，曾经是当时国中富豪。正是那样一个亦官亦商的富厚家业，为他的豪逸洒脱的侠行义举提供了基础。

然而，值得我们羡慕的并不是他们的金钱。世界上富甲一方、腰缠万贯的巨商大贾很多很多，然古代成为诗仙的，只有太白；现代留下护藏国华之美名的，只有伯驹。

世上有钱人有两种。一种人既有钱，更有雄心逸志，便能特立独行，在某一事业上做出非凡贡献，青史流芳。另一种人虽有钱，却猥琐庸俗，只知吃喝嫖赌，精神贫乏，也许自以为快活一生，其实是虫鸟物类之快活，并不知何为人生。当代这后一种人，据传甚多。国家改革开放的这些年里，一些人财运亨通，暴发而成巨富，不论群众如何的买房困难、看病困难、子女上学困难，他们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已经钱财多得不知该如何消受，于是有人携巨款到境外豪赌，穷奢极欲，挥霍无度。如此富人，徒有华丽

外表，内实污秽不堪。

世上没钱人也有两种。一种人虽无钱，外形寒酸，内在却有高情雅趣，有道是“唐之诗人，类多穷士”，甚至有“乞丐诗人”。陶渊明曾作《咏贫士》诗云：“倾壶绝馀沥，窥灶不见烟”，“敝襟不掩肘，藜羹常乏斟”，“岂不实辛苦，所惧非饥寒，贫富常交战，道胜无戚颜”。你看他酒壶干得一滴不也倒不出来了，厨灶也不见烟火了，破衣烂裳露着肩肘，这实在是太穷苦了，然而他所惧怕的不是饥寒，而是最怕失去道义原则，贫富二字常在内心交战，“贫而有道”属于他心中的胜利者，只要守着正道，脸上就不会有悲戚的容颜。这就是陶渊明笔下的贫士。另一种没钱人，则缺乏这种道德的力量，因生活所迫而至于胡作非为，所谓“民贫则奸邪生”，贫而贱，贫而无耻。贫穷是可悲的，贫而无耻则更加可悲。可见无论贫和富，精神是极重要的。无论贫和富，只要精神卓尔不群，就可以成为名士。

如果我们只是复述张伯驹先生那些利国的好事，似乎并无必要；然而，当我们透过行为现象，观照一个人的精神世界的时候，却会是别有意趣的。

## 二

李白诗集中有一首《书怀·重寄张相公》，写道：

本家陇西人，先为汉边将。功略盖天地，名飞青云上。  
苦战竟不侯，当年颇惆怅。世传崆峒勇，气激金风壮。  
英烈遗厥孙，百代神犹王。十五观奇书，作赋凌相如  
……

这首诗中，李白称自己是西汉著名边将李广的后裔。“飞将军”功盖天地，未能封侯，其英烈之气却遗传于后代。李白或许是继承了先祖灵根，所以少年有为，天才英特。“十五观奇书，作赋凌相如”，是把自己比做西汉大文学家司马相如。而在另一首诗中，他还说过：“五岁诵六甲，十岁观百家。”可知其童少年的时候是何其聪慧，对于历史古籍早已广泛涉猎。他二十岁时所写的《大猎赋》，其中有句云：“擢倚天之剑，弯落月之弓；昆仑叱兮可倒，宇宙噫兮增雄。”确有司马相如的阔大气魄。

然而，李白在政治生涯中却屡遭失败。唐玄宗召李白入京，曾以翰林供奉的身份，待诏一年多时间，后来遭人谗毁而“赐金还山”。到安禄山叛乱时，又应永王李璘的征召，随其东巡。永王兵败后，李白被囚于狱，落入“世人皆欲杀”的境地。汾阳王郭子仪站出来为他说话，才把他的死罪改成流放，在流放去往夜郎的途中，有幸遇上了大赦。

上面所引《书怀·重寄张相公》，就是李白出狱后，写给当时的朝中宰相张镐的诗，诗中表白心愿，还有东山再起的意思。此

诗中还写道：“想象晋末时，崩腾胡尘起。……抚剑夜吟啸，雄心日千里。誓欲斩鲸鲵，澄清洛阳水。”这是以西晋末年的“五胡乱华”的历史，借指安史之乱，表示诗人斩鲸平乱的雄心。诗意最后则归结到惩灭敌虏后，并不求论功封赏，只愿飘然而去，永作海外的游仙：“灭虏不言功，飘然涉方壶。惟有安期舄，留之沧海隅。”“方壶”，是传说中的海上仙山。“安期舄”即安期生，蓬莱仙人。

李白在这篇诗歌中所表达的政治抱负，和功成之后归隐学仙的心愿，是他的一贯思想。早年写的《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》中，他就说过：“达则兼济天下，穷则独善一身”，表示要立志奋其智能，辅助帝王，“使寰区大定，海县清一”，然后则愿像陶朱、留侯一样去“浮五湖，戏沧州”。然而，他的政治抱负始终不能实现，因而也始终不能达到其“功成身退”的隐士、仙家、道人的愿望。历史只能让李白成为一个诗人，让他成了一个沉浸在醉态和梦幻中的诗人。历史为人类造就了一个诗仙。

张伯驹所收藏的极品文物，其中一件便是十分难得的李白的书法《上阳台帖》。一九五六年伯驹致函毛泽东主席，并赠送此帖，交由中央统战部徐冰转呈。原物现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。

《上阳台帖》为白麻纸本，草书，五行二十五字。前隔水有宋徽宗泥金书签，引首有清乾隆皇帝所题的“青莲逸翰”四字，并钤有多家鉴藏印。宋代黄庭坚题跋云：“及观其稿书，大类其诗，弥使人远想慨然。李白在开元、天宝间不以能书传，今其行草殊不

减古人。”书评家都认为，李白作书如其作诗，高视阔步，物我皆忘，心闲笔纵，无不如意。此帖所写的内容，有“非有老笔，清壮何穷”的句子，字意一体，表现了这位诗仙的沉雄放达的气度。

《上阳台帖》原藏于清内府，清末流出宫外，为张伯驹发现后购藏。伯驹鉴认此帖为李白真迹，他在《丛碧书画录》中记曰：“余曾见太白摩崖字，与是帖笔势同。以时代论，墨色笔法非宋人所能拟。《墨缘汇观》断为真迹，或亦有据。按《绛帖》有太白书，一望而知为伪迹，不如是卷之笔意高古。”

张伯驹对《上阳台帖》的收藏，除了体现其对国家文物的珍爱之外，同时也体现出他对诗仙李白的钦慕。历史相隔遥遥一千二百余年，李白不仅有近一千首诗歌一直为人们吟诵，而且竟然还有他的墨迹幸存人间，尤其是中国文化人的灵魂如此递相沿袭，绵延不绝，想到这一点，不能不让我们感到这是多么值得庆幸的事情。

李白产生于李白的时代，伯驹出现在伯驹的时代，不可拟比。这个时代不可能诞生诗仙，这个时代却可以有艺术收藏鉴赏家。任何人的思想气度、德业功次，都不可能超越其历史环境。然而，名士都有同样的风流。有道是：“名下无虚士”，“是真名士自风流”。

### 三

笔者因职业所限,长期埋头于案牍中,以前与文艺界人士接触甚少。一次在朋友家里,偶尔看到一卷张伯驹手写的词稿。他的词,吸引了我,内心为之一震。大概由于文化断层已久,风气丕变的原因,当代人写的词,多有词语生硬、意味贫乏之病。而伯驹的词,是真正词人的词,可以读出古人的遗韵,这在当代词林中已殊为难得。由此而始,我便随时留意张伯驹的著述,以及有关他的生平事迹的评介。

其时我还在高级法院的岗位上。我所学习的专业只是法律。

法学教育的根本,并不在乎要记熟多少法律条文,而是重在培养一种崇尚法治的精神和公平正义的理念。真正研读法律的人,都会具有奉法律为至高无上、以护持正义为己任的基本品质。或许由于这种本质上的原因,法学界人士在社会政治形势的变化中,往往显得书生气而反应迟钝。正当司法体制改革成为社会热议的时候,我也曾经抱着某种热情和期待,而在实际进行中,才感觉到我们面对着许多复杂的情况。改革者的任何良好的意愿和举措,都可能会被他人利用而产生逆向的结果。我并不善于研究社会问题,而我所在的岗位却使我领教了各色人物,看到了那些离奇的现象。忽然有一天在无意中想到了张伯驹先生。忽然觉得这老先生不愧是现代社会的翘楚人物,他比我们这些

学习法律的人要高超出许多。

除了先生的词令人喜爱，他收藏古代书画的事迹亦令人感慕。文物收藏真正是一件好事、雅事。既是为国家珍藏国宝，保护民族文化，而对自己来说，无疑也是一种情趣陶冶，大有益于身心。即使一九五七年被打成“右派”，“文化大革命”中再遭厄难，张伯驹始终精神不萎，照旧于诗词书画如醉如痴。法律界的人士却不会有这样的潇洒。法律无法与艺术相比，艺术很有情趣，而法律是很枯燥的。法律也不能与政治经济相比，政治经济可以随机应变，可以投机取巧，法律却以正直、稳固为特征。在政治经济的跃变之际，法律总是滞后的。那一场灾难性的“反右”运动中，各级法院属于重灾区，“右派”之比例据说高于其他党政机关。尔后的“大跃进”时代，仍然有许多法律专业人士不能随应形势，而被指斥为“右倾”和“旧法观点”。艺术家即使戴了“右派”帽子，也还会有机会进行自己的艺术创作。许多法官被打成“右派”之后，却完全销声匿迹了。他们之中会不会有人走上艺术品收藏的路子呢，那个年代的书画价格还很低廉，如果偶有觉醒者，应该是一种幸运吧。

九十年代初在太原市府西街有一片闲置的空地。喜好收藏的人们习惯在那里交易。那时我家住在附近，星期日闲逛偶然发现了这个市场。可惜我并没有及时从繁忙的事务中解脱出来。一方面要给络绎不绝的诉讼者排难解纷，另一面却承受着多种的干扰和莫名的发难，加之审判机关的自身建设，涉及人财物诸多